

# 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的方法论构建

——基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考察

谢莹莹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2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30日

## 摘要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两篇著作, 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方法论的构建。《提纲》以“实践”为核心, 完成了历史科学的本体论奠基, 为历史科学提供了哲学宣言; 《形态》则以系统的历史分析, 将这一宣言展开为具体的方法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科学, 在自然与历史的辩证关系中, 以“感性活动”扬弃唯心主义与直观唯物主义的二元对立论, 确立历史科学的现实起点; 在分工与所有制的辩证关系中, 揭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 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 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中, 以世界历史的视野分析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定位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不仅实现了对历史理解的科学化, 更奠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以实践为根基、以批判为方法、以改变世界为指向的总体范式。

## 关键词

历史科学,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德意志意识形态》, 方法论

# The Method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Marx and Engels' Historical Science

—An Examination Based on *Theses on Feuerbach* and  
*The German Ideology*

Yingying Xie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May 25, 2026; accepted: June 17, 2026; published: June 30, 2026

## Abstract

*Theses on Feuerbach* and *The German Ideology* mark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 of Marx and Engels' historical science. Centering on "practice", *Theses on Feuerbach* completes the ontological grounding of historical science, providing a philosophical manifesto for it. *The German Ideology*, through systematic historical analysis, unfolds this manifesto into a concrete methodological system. The historical science founded by Marx and Engels, withi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history, sublates the dualistic opposition between idealism and intuitive materialism by means of "sensuous activity", thereby establishing "historical nature" as the real starting point. Withi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forms of ownership, it reveals the contradictory movement between productive forces and forms of intercourse, grasping the immanent law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Withi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ity and world-historical existence, it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communism and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proletari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history. Marx and Engels' historical science not only achieves a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but also lays down the general paradigm for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tific research, which takes practice as its foundation, critique as its method, and the changing of the world as its aim.

## Keywords

Historical Science, *Theses on Feuerbach*, *The German Ideology*, Methodolo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历史科学”作为连接马克思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共产主义理论的关键枢纽，最早可以追溯至马克思、恩格斯在 1845 年相继完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提纲》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以格言形式凝练了历史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形态》则将这一原则转化为更加体系化的历史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的手稿中明确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2], p. 516)旨在确立一种以“历史”为根本解释原则的全新科学范式，取代以往一切思辨的历史叙述，达到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理解。

国内学者追溯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源头是马克思的历史科学[3]，提出“历史科学”应当称之为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4]。历史科学何以是一门科学？对于这一问题，学界已经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研究范式遵循三条路径：一是聚焦关键文本，追溯“历史科学”问题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出场语境、演变轨迹及其最终转化过程[5][6]；二是着力辨析“历史科学”“历史哲学”与“实证科学”的复杂关系，以厘清“历史科学”的根本性质[7][8]；三是探讨“历史科学”独特的研究与叙述方法，并将其视为“历史科学”科学性的关键[9][10]。这些研究对于澄清“历史科学”的独特内涵，深化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具有重要价值。然而就澄清一门“科学”所具备的客观性、规律性、总体性而言，仍需回到经典文本，通过对马克思历史科学的构建过程的分析加以补充。

## 2. 历史解释的基本原则：从“感性活动”到自然与历史的统一

一门科学的成立，首赖于其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与确定性。马克思在《提纲》中以“实践”即人的感性活动为核心，彻底颠覆了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的理解方式，为历史科学奠定了存在论基础。这一基础在《形态》中进一步深化，实现了自然与历史的辩证统一。

### (一) 《提纲》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范式的根本批判

在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中,自然与历史往往被置于二元对立之中。黑格尔将自然视为绝对精神的外化,历史是精神自我认识的历程,自然界是“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离开来的自然界”([2], p. 220);而费尔巴哈虽然恢复了感性自然的地位,却未能看到自然通过人的实践而被中介的历史性维度,因此《提纲》第一条开宗明义:“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 p. 499)这一论断包含两个层面的批判:其一,旧唯物主义虽然承认感性存在的优先性,却将感性对象仅仅视为被动的客体,从而放弃了主体能动性的一面,其“直观”只是静观直观。其二,唯心主义虽然发展了主体的能动方面,却只是抽象地发展了,而非现实的、感性的活动。马克思提出的“感性的人的活动”,就是要扬弃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基础,确立全新的现实的哲学起点。

### (二) 明确历史科学的现实出发点

“感性活动”是对费尔巴哈静态直观的“感性”的批判性改造,将“感性存在从被动的感性(受动)导向主动的感性(活动)”[11]。其实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开始使用“对象性活动”这一概念,在《提纲》中他进一步明确提出“感性活动”概念,并将其与“实践”相关联。在这里,“感性活动”与“实践”已经同义,强调人通过物质生产、社会交往和历史实践不断构建和变革世界的过程。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则更加直接地指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2], p. 531)。在此基础上,感性活动不断展开,形成更复杂的社会关系,形成国家、意识形态等历史现象。由此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历史科学的现实出发点。

感性活动是人类世代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解释感性活动的社会历史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2], p. 528)每一代人都在前人活动所创造的条件下展开新的实践,这些实践又反过来改变了感性世界的形态与内容。因此,自然并非外在的、不变的实体,而是内在于人类历史进程之中,并通过劳动、交往等感性活动而不断生成的历史现实。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才说“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对费尔巴哈而言是“不存在的自然界”([2], p. 530),这一理解将感性活动建立在人类发展历史基础之上,进一步阐明唯有从具体的、历史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才能真正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内在机制。

### (三) 历史科学中自然与历史的实践统一性

“唯物史观所达成的现实性立场,不仅是社会的现实,而且是历史的现实。”[12]《提纲》第三条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 p. 500)环境的改变与人的自我改变在实践中达到统一,这是因为实践本身就是一种对象性活动,人在改造对象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自身。《形态》进一步发展为实践中“自然史和人类史彼此相互制约”([2], p. 516),即一方面自然是被人的实践不断中介的历史性存在,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另一方面人类的历史始终要受到自然的制约。历史是“自然的历史”,而自然是“历史的自然”,明确了自然与历史的统一关系。

这种统一性强调自然与历史不是两个独立的序列,而是在物质生产实践中相互交织的过程。“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2], p. 516)这种“划分”指的是划分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人的关系在实践中互为条件、互相制约。具体而言,“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2], p. 534),这表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产生特定的社会交往形式,而特定的社会关系,又规定着人们开发、利用自然的方式。这对历史科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停留于分析纯粹政治事件或思

想斗争，而应该进一步揭示社会形态与其物质基础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统一性的关系下，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对割裂自然与历史二者关系形而上学思维的新超越”[13]，重塑了对“客观性”的理解。自然的客观性不等于与人无关的“自在性”，而是在人类实践中被不断改变的“历史的自然”。正如马克思后来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4]这些条件既包括社会关系，也包括已经被历史中介了的自然。这些条件一旦产生，就变成了一种客观的外在因素，规定着人的活动。

### 3. 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从“社会关系总和”到分工与所有制的矛盾运动

在确立了历史科学的客观性之后，我们何以可能把握这种客观性呢？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揭示这种现实具有客观的规律性。《提纲》从社会关系角度对人的本质的剖析，为分析历史规律提供了存在论基础，《形态》则进一步通过对分工与所有制辩证关系的分析，揭示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这一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 (一) 人的本质规定与历史分析的核心线索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 p. 501)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标志着他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彻底决裂，强调了想要理解人，就必须理解塑造人的具体社会关系。而《形态》则沿着这一路径，找到了剖析社会关系生成与演变的关键线索——分工与所有制。

分工与所有制是描述同一社会过程的“同义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2], p. 536)这里的“活动”指的是人的感性活动，特别是物质生产实践及其组织形式。而“产品”则不仅指劳动产品本身，更指由此衍生出的对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占有的权利。分工的分化，必然导致劳动产品占有的分化。当农业、手工业、商业劳动分离，城乡对立与不同的利益集团便得以形成。当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工出现，意识才能独立化，从而为意识形态的生产奠定基础。同样，分工使“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2], p. 535)，这直接巩固了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对劳动者的支配。因此分工带来的结果就是稳定的、法权意义上的所有制关系。

通过对人的社会关系本质，以及分工与所有制关系的深刻把握，马克思与恩格斯将历史发展的动力从观念层面，拉回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的矛盾运动之中。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分工不断演化，社会的所有制形式也不断演变。接着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剖析了这一演变的内在动力。

#### (二) 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是历史演进的内在动力

分工的发展与所有制的变迁背后更深层的动力机制是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规律。“交往形式”指的是与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包括所有制在内的社会关系总和，也就是马克思后来更明确表述的“生产关系”概念。

生产力的发展，首先会推动分工的深化与扩大。新的分工要求新的协作方式和劳动组织形式，即新的“交往形式”。起初，这种交往形式是适应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成为“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2], p. 575)然而，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与现存的交往形式发生矛盾。这时，原本作为生产力发展形式的交往形式，就变成了束缚其发展的“桎梏”，终将为社会历史所扬弃。西欧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便是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推动历史演进的客观例证。中世纪晚期的技术进步和贸易扩张催生了新兴工场手工业，但农奴制与行会制度束缚了劳动力和市场的发展。于是，这一矛盾以一系列社会革命的形式展开，最终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封建所有制为结果，历史由此进入新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以大工业的兴起为例，进一步阐释了这一矛盾。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的发展、机器

的采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但这种社会化的生产力，与“私有制”这一交往形式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2], p. 566)。当生产力与交往形式激化时，“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2], p. 567)。当旧的所有制形式被打破，新的、能够容纳更发达生产力的所有制形式得以建立，历史由此进入新的阶段。这一分析彻底颠覆了少数人意志或抽象理念决定历史的唯心史观，为历史演进提供了客观物质性的解释。

### (三) 历史阶段的科学划分与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

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不在于对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揭示，更在于对具体社会发展形态规律的解读[15]。基于分工与所有制的同一性分析，以及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运动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系统地勾勒了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过程并划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时期。

第一阶段是“部落所有制”。分工并不发达，与之对应的是以家庭和部落共同体为基础的原始公有制，潜藏着最初的奴隶制。第二阶段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随着分工的发展，城乡对立出现，产生了“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第三阶段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分工较少，但城乡对立鲜明，土地贵族与农奴构成基本的阶级关系，城市中则对应着“同业公会所有制”([2], pp. 521-523)。在封建制度的缝隙中，逃亡农奴聚集于交通要道进行商业买卖，形成了新的交往与分工，这便是现代市民社会的雏形。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分工急剧扩大，最终催生了“纯粹私有制”([2], p. 583)，即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演进，表明了历史的更迭不是精神或者人的抽象本质的展开，而是基于“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2], p. 545)这一现实基础而实现的客观进程。

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一种内在于历史实践本身的客观规律。这种规律表现为生产力的积累推动了分工的细化，而分工的演进重塑了所有制关系，僵化的所有制形式终将被新的生产力所突破。历史呈现为一种由生产力与交往形式运动所主导的规律性。尤为重要的是，这一规律内在地蕴含着一个空间转向。当分工与所有制的矛盾积累到一定阶段，其自我扩张的本性便不再满足于地域的界限。“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2], p. 566)。对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科学把握，必然要求我们将分析视野从民族性的、封闭的空间，扩展至全球性的、普遍交往的场域。历史科学的分析框架，便从对时间演进序列的梳理，自然过渡到对整个世界历史层面的考察，为理解民族与世界的辩证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4. 世界历史的广阔视野：从“人类社会”立脚点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在揭示了历史演进的内在规律后，历史科学的任务并未终结。必须回答这种基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规律，是在何种范围内展开并相互作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2], p. 502)在这一立脚点上，他们扩展了“世界历史”的总体性视野，把握共产主义的历史定位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 (一) 世界历史：物质生产实践发展的必然产物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 p. 501)，马克思、恩格斯遵循着实践出发寻找问题根源的思路。他们指出，随着人们的物质生产和交往的发展，历史开始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而这一过程是“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2], p. 541)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使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消费成为了可能，以往那种“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 p. 541)

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一系列社会历史影响，带来了“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

个人所代替” ([2], p. 538) 的趋势。个人的生存条件、实践活动及其影响, 越来越不再局限于某个区域, 而与全球性的生产与交换紧密相连。催生了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阶级, 即无产阶级, “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 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 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 ([2], p. 567) 无产阶级因其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的共同处境和共同利益, 天然地具备超越民族国家狭隘界限的性质, 成为了世界历史性的存在。

### (二) 共产主义: 世界历史内在矛盾的必然出路

“世界历史”的提出, 将历史科学分析的视野从对单一区域内部的考察, 推进到对全球交往关系的总体把握。在这一视野下, 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进程内在矛盾的发展的产物。

世界历史进程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根本矛盾, 从一国内部推向全球, 为社会形态转变创造了物质条件与社会条件。当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这在一国内表现为单个企业内部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大生产的无政府状况, 在国际上则表现为日益全球化的生产协作与生产资料为私人, 或民族国家范围内的资本家集团所占有。这一矛盾在世界市场上演变为盲目的竞争、全球资源的掠夺开发以及周期性的全球经济危机。当冲突达到顶点, 打破这一桎梏便成为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的客观要求。

共产主义是实现个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真正形式, 只有在这一条件下, 由世界历史所创造的普遍交往和全面发展的可能性, 才能从一种异己的、盲目的力量, 转化为人们自由自觉的力量。由此, 《提纲》所强调的“人类社会”获得了具体的历史内涵: “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 ([2], p. 541) 正如后来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谈到的, 唯有到此时, 人们才最终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 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 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16], 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 (三) 无产阶级: 世界历史性使命的承担者

历史科学不仅揭示客观规律, 以及规律的作用范围, 更指明了顺应规律、促进历史发展进步的主体力量。人类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是要打破“支配-从属”的世界生产关系 [17]。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界历史的框架下科学地分析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 并指明他们所肩负的人类解放的使命。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指的是他们对自身世界历史性的自觉认识。这一认识源于无产阶级客观的、普遍的生存状况, 即“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 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 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 ([2], p. 542)。当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这种状况塑造为全球工人阶级的共同命运时, 对这种状况的反思与反抗便具备了普遍性的内容。“这个阶级构成了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 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 即共产主义的意识” ([2], p. 542)。这种意识必须包括无产阶级对自身阶级状况的认识, 对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不可调和的认识, 以及对除革命以外再无推翻阶级统治体系的其他方式的认知, 唯有这种认识才能让无产阶级从“自在”向“自为”转变, 真正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无产阶级在承担起世界历史使命的同时, 不断对自身进行改造。无产阶级诞生于旧社会, 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思想因素, 在推翻现存秩序的激烈斗争中, 无产阶级不仅在革除腐朽、陈旧的社会因素, 更在集体行动中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 不断克服自身观念的狭隘性, 培养能力与品格, 更在组织形式上实现国际的联合。无产阶级历史主体地位的确立, 也唯有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才能得以最终实现。

以往的革命最多只是触及所有制的变革, 而无产阶级要彻底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奴隶制、封建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嬗变, 改变的只是剥削与统治的具体形式。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 消灭劳动, 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 ([2], p. 543)。“消灭劳动”

意味着消灭在私有制与强制性分工下作为谋生手段的异化劳动。无产阶级之所以被赋予这一空前彻底的历史任务，正是因为它本身已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 ([2], p. 543)，它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其解放无法通过获得某种新的私有财产形式来实现，唯有消除一切剥削与压迫，才能实现彻底的人的解放。

## 5. 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在《提纲》与《形态》中共同完成了历史科学方法论的奠基。《提纲》以实践为核心，完成了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哲学范式的批判，确立了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形态》延续了《提纲》的分析视角与方法，两篇著作在自然与历史、分工与所有制、民族与世界的三重辩证关系中，构建了兼具客观性、规律性与总体性的历史解释范式。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研究并未止步于此，这一理论在《资本论》中达到成熟。同时马克思也通过《法兰西内战》《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将之运用于具体的历史情境的分析上，这进一步表明历史科学不是一种哲学体系，更不是一种经验科学，而是一种以现实为根基、以批判为方法、以改变世界为指向的，具有科学性质与实践价值的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内蕴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为后世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关键的思想资源与分析工具。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将历史与自然相统一的分析视角，将其推向生态批判与社会理性批判；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年鉴学派在分工与所有制的矛盾分析框架下，分别走向了功能解释与方法论上的长时段结构分析；世界体系理论与后殖民主义则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扩展为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结构与文化政治的分析。可见，历史科学为全面理解人类社会历史提供了一套科学的研究视角与分析工具，使人们能够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对其加以运用。正是这种科学性与开放性，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不断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视域拓展与范式创新。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66.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3] 王海军. 从“历史科学”到“新社会科学”: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概念的学理探源(1919-1949)[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5, 39(4): 123-134.
- [4] 王南湜.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异化”概念: 马克思社会科学理论构建的原点[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9(6): 22-31.
- [5] 杨韵韵. 马克思历史哲学中的黑格尔因素[J]. 宁夏社会科学, 2023(5): 20-26.
- [6] 胡芳. 马克思创建剩余价值学说的演进逻辑与历史科学的运用[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73(4): 1-12.
- [7] 方瑞, 万飞鸿. “历史科学”的解释争议与方法论自觉——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考察[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4(6): 52-58.
- [8] 张文涛. 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概念的意蕴[J]. 甘肃社会科学, 2015(5): 139-144.
- [9] 吴晓明. 唯物史观的具体化定向与历史科学[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2(5): 46-59.
- [10] 户晓坤. 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与方法论的哲学变革[J]. 哲学研究, 2018(8): 27-35.
- [11] 刘建江, 贺新元. 马克思感性概念的哲学革命意蕴——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中心的考察[J]. 河南社会科学, 2022, 30(3): 96-102.
- [12] 吴晓明. 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的前提批判[J]. 天津社会科学, 2025, 4(4): 4-15.
- [13] 严卿. 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与自然统一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 湖南社会科学, 2025(4): 9-16.
- [1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669.

- 
- [15] 唐正东. 历史规律的辩证性质——马克思文本的呈现方式[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10): 4-18.
- [1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817.
- [17] 吴宏政. 通向“普遍的世界历史”的唯物史观之路[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5(3): 49-58+151.